

宋元外销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熊翠燕 (南京大学历史系)

摘要：宋元时期外销瓷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外销瓷的研究逐步走成系统化、成熟化。本文将我国宋元外销瓷的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对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作了简要的评价。同时，对于瓷器外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与展望。

关键词：宋元；外销瓷；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2-0070-06

外销瓷，作为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自唐末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一些地区。我国对于外销瓷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叶文程先生在《关于我国古外销瓷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1]，对国内外古外销瓷研究工作做了简要的回顾。继而，又有刘洋的《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外古外销瓷研究回顾》^[2]，将我国外销瓷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这两篇文章都对我国古代外销瓷研究状况做了梳理。但是，对于宋元时期的陶瓷外销研究的情况略有涉及而未作专论。因此，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宋元时期古外销瓷的研究作一个回顾，并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 宋元外销瓷研究的回顾

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瓷器外销，无论在外销地区、外销种类和数量上都有所扩大。回顾我国对宋元时期外销瓷研究状况，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

这一时期的外销瓷研究，韩槐准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涉足于该项研究，先后在《南洋学报》上发表了十几篇专论，如《军持之研究》^[3]、《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4]等。其《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一书^[5]，列举了自汉及清南洋地区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并结合文献，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对宋元时期销往南洋的瓷器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阎文儒先生《从考古发现上看阿剌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6]，简述了中东各国出土的我国唐代至明代的瓷器。陈万里先生《宋

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一文^[7]，对宋、元、明时期有关瓷器出口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历代瓷器的对外输出作了简略介绍，并对当时外销瓷的输出路线、类别、外销青瓷的产地以及民用瓷器的对外输出进行了概括。夏鼐先生《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则介绍了北非、东非、西非各地出土的由唐至清的中国瓷器的状况^[8]。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我国对宋元外销瓷研究的肇始阶段，为此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2，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

从1963年以后一直到1976年，我国对于宋元外销瓷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阶段。1976年，在朝鲜半岛新安海底发现的元代沉船引起了学术界对此的广泛关注。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9]，将沉船中发现的瓷器，分为龙泉窑系的青瓷，景德镇窑系的影青瓷，磁州窑系的白釉褐彩、白釉黑彩和黑釉瓷，吉州窑瓷器，建窑的黑釉瓷，钧窑系的钧釉瓷，以及酱褐色、黄褐色或黑色釉的粗瓷，并对沉船中瓷器的时代和沉船年代作了分析。叶文程先生的《从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的文物看元代我国陶瓷器的发展与外销》^[10]，通过对沉船中发现的我国元代陶瓷器的研究，探讨了元代陶瓷器的发展与元代我国陶瓷的外销。

1980年，在福建省德化县召开的德化窑学术讨论会期间，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1年，在广东省新会召开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首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上，就陶瓷的外销年代、外

销地区、外销产品种类、外销窑口和窑址、广彩的外销问题、外销港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1]。其中,对宋元外销瓷的上述方面也有所论述。此次会议的召开,是我国外销瓷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我国外销瓷的研究由个体转为团体,学术交流更加广泛。1982年,第二次古外销瓷学术讨论会在江西吉安召开。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吉州窑及黑釉系统瓷器、古外销瓷器和其它窑口陶瓷器的一些问题^[12]。1987年,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在福建省晋江召开。会议着重围绕六个方面进行讨论^[13]。(1)陶瓷生产与外销;(2)外销瓷的传播渠道及地区;(3)国外发现陶瓷的重新认识及窑口归属;(4)各个历史时期对外销瓷需求的变化;(5)青花瓷器何时作为商品行销于国际市场;(6)外销瓷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方向等学术问题。此次会议不久,出版了《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14]。文集收录了34篇论文,其中有17篇论及宋元外销瓷的问题。1991年,两会与深圳市(海外)中国古陶瓷文化研究会联合召开了“中国古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专题学术讨论会^[15],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1)中国陶瓷对世界文明的贡献;(2)中国古陶瓷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3)从中国古陶瓷看中日、中非文化交流;(4)中国各窑口瓷器的外销。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对古外销瓷的研究逐步成熟。总结这一时期对我国宋元外销瓷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外销陶瓷通论。陈振裕《外销瓷的几个相关问题》^[16]一文,论述了陶瓷外销与对外交通贸易的关系、瓷器生产与外销瓷的关系、各国需求外销的变化等三个问题。王文强《略述我国陶瓷的外销及其影响》^[17],将我国陶瓷外销分为唐五代、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并谈及了中国的外销瓷对于国外的影响。叶文程《中国古陶瓷与国外社会生活》^[18]一文指出我国陶瓷的外销对世界文化产生的影响。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19]概述了历代我国瓷器外销的类别及外销国家。李德金《8—14世纪中国古外销陶瓷》^[20]一文论述了由唐至元外销瓷种类、窑口以及古外销陶瓷对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促进作用。

2,宋元时期外销陶瓷概述。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21]在分析宋元时期瓷业发展的几个特点的基础上,解析了宋元时期瓷器大量

外销的原因,并对日本、巴基斯坦等地出土的宋元瓷器进行了介绍。李辉柄《从文献看元代瓷器的外销》^[22],从文献的角度着重对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有关贸易用瓷的记载进行了分析。叶文程《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一文^[23]从宋元时期的文献资料、外销背景入手,概述了这一时期我国陶瓷的海外贸易。

3,宋元时期不同窑口、窑系外销瓷器专论。叶文程《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24]将东南沿海各省的瓷窑分为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建窑黑釉瓷系、景德镇青花瓷器四大窑系,对照国内外出土的资料,阐述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海路运输,但宋与元的外销港口有所差异。在其《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25]一文中还论述了龙泉青瓷大量外销的原因,考察了其外销国家和地区、外销路线以及类别等问题。褚振西《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探》^[26]一文介绍了在日本、阿曼、埃及、坦桑尼亚四个亚非国家发现的耀瓷标本,由此勾勒了外销耀瓷的销售范围及运输路线。作者指出耀瓷主要是由海路运输,同时,由于耀州窑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不排除经由陆路“丝绸之路”运销的可能。宗毅《试谈磁州窑在国外的影响及其传播》^[27]谈到了磁州窑在陶瓷史的地位,对中国及周围各国陶瓷艺术的影响,以及磁州窑器的对外传播路径主要有南北两条道路:北方由陆路运往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东南地区主要由海路输出,东达朝鲜和日本,南达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地。田海峰《从景德镇和梁子湖青白瓷的生产谈青白瓷的外销和内销的关系》一文^[28],提出青白瓷作为外销商品,其运输方式分陆路和水路两路种,其中又以水路为主。陆路即传统的丝绸之路,海路即海上“陶瓷之路”。叶文程《试谈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外销》^[29]和《景德镇陶瓷的外销》^[30]、李再华《略谈景德镇宋元瓷器外销》^[31]、张浦生《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32]、刘树林《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33]等一系列论文,则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宋元时期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情况。叶文程、苏垂昌、黄世春《晋江磁灶窑的发展及其外销》^[34]、徐本章、苏光耀、叶文程《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35]、徐本章、叶文程《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窑外销瓷器》^[36]、《再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37]、沈玉水《德化古陶瓷外销琐谈》

[38]等一系列论文,着重讨论了宋元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外销到东南亚地区的瓷器类别、原因及影响。叶文程《中国黑釉瓷外销初探》[39]则考察了我国黑釉外销状况、外销地区及其成因以及黑釉外销瓷在外销中的地位。

4,对不同地区、省份外销陶瓷的论述。余家栋《宋元明时期江西外销瓷初探》[40]结合文献记载,对江西出土的几件瓷器的分析以及同国外发现的实物资料进行对比,探讨了江西宋元明时期的瓷器外销。叶文程《晋江泉州古外销陶瓷初探》[41]、《略谈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42]、《福建晋江县古外销陶瓷初探》[43]、林文明《泉州陶瓷外销问题的探讨》[44]、许清泉《宋元泉州陶瓷的生产与外销》[45]、栗建安《福建陶瓷外销源流》[46]则是对福建的外销瓷各个方面的研究。冯玉辉《瓷器的外销与衡阳陶瓷业的繁荣》[47]将衡阳地区的瓷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宋元时期是彩瓷的产生和繁荣期,并指出衡阳地区陶瓷业的繁荣与外销成正比关系。陈丽琼《试谈四川的古外销贸易瓷》[48]一文探讨了四川邛窑系与铜官窑、越窑、建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粗略指出四川古外销瓷外销路线分为海路与陆路二条。李广宁《安徽古代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初探》[49]概述安徽省境内瓷窑的分布与生产状况,以及安徽古代瓷器的外销路线。即瓷器的出海港口主要有两个:扬州和杭州。但杭州如何作为出海口呢?季志耀《试谈浙西宋元窑址及其产品外销》[50]介绍了浙西地区的陶瓷外销路线。以上对于各省份外销路线的研究,大都只是提出了一个设想,没有有力的证据,或者严密的推论过程。

5,对瓷器外销地的论述。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51]从瓷器外销史料着手,结合国外出土的我国瓷器,论述了由唐至元我国瓷器在日本、朝鲜、菲律宾、文莱、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埃及十个国家的出土情况。叶文程《宋元明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52]一文从文献记载、国外瓷器资料以及福建发现宋元明时期的外销陶瓷窑址三方面论述宋元明时期我国陶瓷外销到东南亚的情况。庄良有《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53]从宋元德化白瓷在菲律宾的出土谈到中菲贸易史。马希桂《从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土看中肯两国久远的贸易交往》[54]介绍肯尼亚出土的大量中国瓷器,追溯瓷器到达肯尼亚的路线。马文宽、孟凡人的《中

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55]一书初次系统地介绍了非洲地区出土中国瓷器的概况,论述了中国古瓷与非洲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关系,以及古瓷大量销往非洲的原因和中非海上交通路线。王健华《从韩槐准先生的捐赠品看中国古陶瓷在南洋的外销》[56]一文,在分析韩槐准在南洋收集到的300多件我国瓷器的基础上,对我国古陶瓷外销南洋作了历史性的回顾。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57]记述了在福斯塔特所发现的中国陶瓷。在李知宴《论新加坡出土的中国瓷器》[58]一文中,作者根据新加坡福康宁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元代瓷器,探讨瓷器产地、窑口、以及新加坡出土中国瓷器的意义。

6,对外销路线的论述。唐昌朴《我国“南蕃古道”陶瓷外销初探》[59],指出陶瓷外销路线存在着一条“南蕃古道”,即从成都出发,过雅安,经拉萨西出蕃道进入中亚;或经西昌入云南,过缅甸抵印度或南亚地区。但此类通道是否真的存在?则需要今后的考古证实。胡亮《从〈鄂多立克东游录〉看我国元明时期陶瓷外销路线》[60]认为鄂多立克的东游路线即是我国元明时期的陶瓷外销路线。徐平章《试谈澎湖航线与中菲陶瓷贸易》[61]、叶文程《从澎湖发现的宋元陶瓷看宋元时期福建陶瓷陶瓷的发展与外销》[62]二文指出澎湖航线是我国外销瓷的重要集散地,它在沟通中国与南洋一带的陶瓷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7,对海外博物馆藏瓷的介绍。叶喆民《印尼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63]介绍了雅加达马利克博物馆、印尼国立博物馆、雅加达博物馆、海滨博物馆、梭罗王宫博物馆、日惹王宫博物馆、三宝垄历史博物馆与三保宫等7家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瓷器的情况。其《意大利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64]一文,则介绍了意大利帕尔玛中国艺术博物馆、米兰国际文物展览中心、佩萨罗市立博物馆、都灵博物馆、威尼斯“黄金屋”博物馆、热那亚乔索尼博物馆、佛罗伦萨比迪博物馆、罗马市东方艺术博物馆等8家博物馆所藏中国古陶瓷情况。这两篇文章为我们研究外销瓷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基础资料。李辉柄《考察托普卡比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器——兼谈我国青花瓷器的发展》[65]一文探讨了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器有三个特点:器形硕大,器物有盘、碗、壶、瓶、罐五种;纹饰密集,多层次

不留地的装饰方法； 呈色艳丽，画工精细，所藏元青花属来料加工性质。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也开始涉足于水下考古。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迄今为止国内唯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中心。1989年，该中心开展了我国第一批水下考古专业活动。1991-1997年，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察与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在此次考古中，发现了599件元代瓷器，品种有白瓷、黑瓷、翠蓝釉瓷三大类^{〔66〕}。此次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宋元时期海上陶瓷外销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 反思与展望

我国对宋元时期陶瓷外销的研究迄今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在这将近7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外销瓷研究逐步发展，并日趋成熟。对于外销窑口、路线、种类、原因、影响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其中以东南沿海地区的瓷窑，以及海上陶瓷路线，东南亚地区的外销瓷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于外销瓷的研究有所降温。首先是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发现于各地的外销瓷。其次也是由于对外销瓷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了瓶颈状态，急切地需要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从美学、外贸、风俗、历史等方面去研究外销瓷。这当然需要不同领域的各国学者的共同协作，同时要推动外销瓷研究深入发展，尚需解决以下一些问题。

一，外销瓷的定义。对于在国外发现的瓷器，可以分为外销瓷和非外销瓷两大类。所谓外销瓷，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外销瓷只包括经过买卖过程输出境外的瓷器。从广义上说，外销瓷泛指国家或政府之间的赐予与接受的，使臣回程中所携带的，以及民间从事的商业买卖活动的瓷器。非外销瓷即是除此之外，还包括在近现代，通过非法手段流落至国外的古陶瓷器。如果将此混入外销瓷的范畴内，极有可能导致研究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区分国外发现的瓷器是否为真正的外销瓷。

二，外销路线的问题。关于陶瓷外销的路线，据以上论文，主干道有三条：一条即为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提出的所谓海上“陶瓷之路”^{〔67〕}；一条为“南蕃古道”；还有一条即为传统的陆上

丝绸之路。其中尤其对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令人瞩目，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南蕃古道”的研究，或是由于文献缺载，或是由于陶瓷不适合陆路运输，以及考古发掘的不足，则相对比较薄弱。

陆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尤其是蒙元时期，由于欧亚交通路线的畅通、驿站的设立、蒙元政府的重商主义，以及制瓷业技术的发展，都为这一时期的西北陆路瓷器外销提供了条件。而在新疆这一交通要道上陆续出土的一批元代瓷器，也为这一时期西北陆路瓷器外销的繁盛提供了佐证。在霍城县（元代阿力麻里）发现一批元代瓷器和瓷器残片^{〔68〕}。主要为一些日常用品，有盘、碗、盏、罐。瓷片中有龙泉窑、枢府瓷、磁州窑、景德镇窑和钧窑等窑口的产品，包括青花、绛色、白釉黑花以及划纹、印纹等。

又据《长春真人西游记》^{〔69〕}的记录：“（邪迷思干，即撒马尔罕）国人皆以鎗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这一史料至少能够说明以下几点：

1，河中流域，至少在撒马尔罕地区，国人以磁（瓷）器作为生活用具。证明瓷器在这时并非高级贵族的奢侈品。这与上述阿力麻里发现的瓷器相一致。

2，这种瓷器与中原定窑所产的瓷器相似。长春真人称这种瓷器“有若中原定磁者”，“定磁”又为何物？笔者认为，定磁即定窑或定窑系各窑口烧造的瓷器。

3，既然认定长春真人所见之物为定瓷，产于今河北，那么定瓷是如何输入到撒马尔罕一带的呢？撒马尔罕位于阿姆河下游，处于东西交通要道，往东经赛蓝（今奇姆肯特市）、虎司窝鲁朵（今中亚托克玛克东南布拉纳废墟），到达阿力麻里。不难看出，撒马尔罕的瓷器定有一部分是从阿力麻里运输过去的。从阿力麻里到河北，则必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了。

“南蕃古道”：迄今为止，在西藏地区甚少发现有瓷器、瓷片的发现，加之海拔甚高，道路艰险，因此，这条瓷器外销通道是否存在仍是一个问号。

三，外销手段的问题。瓷器与丝绸等物品不同，是易碎物品。那么人们是怎么将其运往世界各地的呢？我们知道，瓷器外销主要是通过海路与陆路。海路自然是通过船只运输，方便且安全

系数高,宋人朱彧《萍洲可谈》中所描述的正是海路外销的情景:“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广隙地也。”^[70]关于陆路运输,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为我们提供了一丝线索。据沈德符记载:“鞑靼、女真诸部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以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余初怪其轻脆,何以陆行万里,即细叩之。则初买时,每一器物纳沙土及豆麦少许,选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发芽,缠绕胶固,试投之牢确之地,不损被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71]

四,国外发现瓷器的窑口问题。国外发现的瓷器窑口的鉴定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因此就有将海外藏瓷或以釉色划分为青瓷系、黑釉系、青白瓷系、白瓷系等。以瓷器的釉色为划分依据的做法虽然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但缺点在于混淆了瓷器产地问题,难以深入研究外销瓷产地的经济、文化背景。或以窑系划分,如景德镇窑系、龙泉窑系、泉州窑系、磁州窑系等。此种划分方法比起前者更加细致,也更科学。这在瓷器具体窑口归属不明的情况下不失为权宜之策,但对于深入研究陶瓷的外销也不是最善之策。笔者认为,对于外销瓷的研究,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分别着手。

微观方面,小至一件外销瓷,具体分析其窑口,从其窑口与外销目的地推出其可能的的外销路线,以及一件外销瓷背后所蕴含的生产地的人文思想,外销目的地的文化内涵。宏观方面,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对釉色、窑口、器形、器形排列组合进行统计,并与各地发现的外销瓷作交叉对比,从中得出不同外销瓷输出地的取向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瓷器生产地的市场占有等问题,进一步追究这种差异是由地理上的原因,还是由人们审美观念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本地瓷窑的生产情况以及经营理念,以及当时国内的交通运输情况。

注释:

[1] 叶文程《关于我国古外销瓷研究的几个问题》,《人类学论丛》1987年。

[2] 刘洋《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古外销瓷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4期。

[3] 韩槐准《军持之研究》,《南洋学报》第10卷

第二辑,1960年。

[4] 韩槐准《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南洋学报》第11卷第二辑,1960年。

[5]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6] 阎文儒《从考古发现上看阿刺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7]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8] 夏鼐《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9] 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10] 叶文程《从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的文物看元代我国陶瓷器的发展与外销》,《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1][15] 叶文程《中国古代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82年第2期。

[12] 叶文程《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纪要》,《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一辑,1983年。

[13] 叶文程、张仲淳《中国古外销陶瓷1987年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88年第9期。

[14]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瓷研究会《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6] 陈振裕《外销瓷的几个相关问题》,《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7] 王文强《略述我国陶瓷的外销及其影响》,《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8] 叶文程《中国古陶瓷与国外社会生活》,《人类学研究》1986年试刊号。

[19]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1期。

[20] 李德金《8—14世纪中国古外销陶瓷》,《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21] 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海交史的研究》1980年第2期。

[22] 李辉柄《从文献看元代瓷器的外销》,《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

[23] 叶文程《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4] 叶文程《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4年刊,总第6期。

[25] 叶文程《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6] 嵇振西《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探》,《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7] 宗毅《试谈磁州窑在国外的影响及其传播》,《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

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8] 田海峰《从景德镇和梁子湖青白瓷的生产谈青白瓷的外销和内销的关系》，《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9] 叶文程《试谈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外销》，《景德镇陶瓷》1987年第4期。

[30] 叶文程《景德镇陶瓷的外销》，《文物天地》2004年第2期。

[31] 李再华《略谈景德镇宋元瓷器外销》，《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32] 张浦生《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33] 刘树林《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34] 叶文程、苏垂昌、黄世春《晋江磁灶窑的发展及其外销》，《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35] 徐本章、苏光耀、叶文程《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考古》1979年第2期。

[36] 徐本章、叶文程《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窑外销瓷器》，《海交史研究》第二辑1980年。

[37] 徐本章、叶文程《再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

[38] 沈玉水《德化古陶瓷外销琐谈》，《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编委会，2002年。

[39] 叶文程《中国黑釉瓷外销初探》，《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40] 余家栋《宋元明时期江西外销瓷初探》，《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

[41] 叶文程《晋江泉州古外销陶瓷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42] 叶文程《略谈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史学增刊。

[43] 叶文程《福建晋江县古外销陶瓷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第1期。

[44] 林文明《泉州陶瓷外销问题的探讨》，《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

[45] 许清泉《宋元泉州陶瓷的生产与外销》，《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

[46] 栗建安《福建陶瓷外销源流》，《文物天地》2004年第5期。

[47] 冯玉辉《瓷器的外销与衡阳陶瓷业的繁荣》，《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48] 陈丽琼《试谈四川的古外销贸易瓷》，《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49] 李广宁《安徽古代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初探》，《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50] 季志耀《试谈浙西宋元窑址及其产品外销》，《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51] 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

[52] 叶文程《宋元明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三上次男博士喜寿纪念论文集》陶瓷编，平凡社，1985年8月，转引自叶文程《中国古外销外销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53] 庄良有《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编委会《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2002年。

[54] 马希桂《从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土看中肯两国久远的贸易交往》，《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55]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56] 王健华《从韩槐准先生的捐赠品看中国古陶瓷在南洋的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57]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第27期1995年。

[58] 李知宴《论新加坡出土的中国瓷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59] 唐昌朴《我国“南蕃古道陶瓷外销初探”》，《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60] 胡亮《〈从鄂多立克东游录〉看我国元明时期陶瓷外销路线》，《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61] 徐平章《试谈澎湖航线与中菲陶瓷贸易》，《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62] 叶文程《从澎湖发现的宋元陶瓷看宋元时期福建陶瓷陶瓷的发展与外销》，《福建文博》，1987年第2期。

[63] 叶喆民《印尼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4期。

[64] 叶喆民《意大利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

[65] 李辉柄《考察托普卡比藏元代青花瓷器——兼谈我国青花瓷器的发展》，《托普卡比宫的中国瑰宝：中国专家对土耳其其藏元青花瓷的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66] 张威主编《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科学出版社2001年。

[67] 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68] 新疆博物馆《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8期。

[69] (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70] (宋)朱彧《萍洲可谈》，《后山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7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